

# 傅斯年归国艰辛求职路

◎其人其事 叶叶胜舟

1926年11月2日,傅斯年从德国留学回来抵达上海。别看他少年成名、“五四”旗手、饱学之士、交游甚广,但求职之路并不顺畅。据其1926年11月致北大同窗、“五四”战友罗家伦的两封信,至少考虑了8个去处,但四处碰壁,十分失落沮丧。

首先是母校北大。他自称“如‘茫茫之狗’者留在上海,岂不都是为了对于北大之忠诚?”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,北京政治氛围肃杀,师生人人自危。北大也是元气大伤,代理校长蒋梦麟和教授鲁迅、朱家骅等被北洋军阀列入拟通缉的黑名单;蒋梦麟、胡适、鲁迅、马叙伦、刘半农、顾孟余、朱家骅、马寅初、王世杰等教授难以容身,纷纷“走为上”。此时傅斯年不可能获得北大教职,不可能献身虎口,而且他也明确与蔡元培共进退,“蔡先生不到北大,故我也不去北大”。

其次,考虑去清华。“托朋友于燕京或清华弄几点钟对付着为生”,但他心思缜密,盘算去清华有“三难”:其一,底气不足。有可能和赵元任一样,既教大书,也在闻名遐迩的国学院做研究。“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,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,梁非我所畏,陈我所敬,亦非所畏。”当时,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三人和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。其二,时机不对。学期已过大半,清华“开学久,功课定”。其三,说不出口。赵元任曾邀他去清华任教,他因想进北大,“故辞之”。现在北大进不去,他不愿吃“回头草”,又向赵开口想进清华,“我最无颜去说”;也不愿向陈寅恪开口求荐,因陈“本是不管闲事的,最不宜奉扰”。但据吴宓1926年11月16日的日记,当天陈寅恪与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商谈,聘傅斯年任清华教授。

再次,考虑去厦大。邀请他去厦大的顾颉刚只是个人愿望,只是说说而已,并未实际操作,“未曾早与人接洽,今乃空着”。这件事顾颉刚做得不靠谱,不仅误导了傅斯年,而且耽误了时间。

第四,考虑去东大。但他有三个顾虑:其一,“张贼(指张学良)来,大家走路”。其二,“无预备,教国文,甚有所



傅斯年

虑”。他解释,此时“对旧学问之见解,实如涌泉”,但适宜做研究,如上讲堂开课,则一时有困难。其三,不愿过多麻烦朋友。因为东北大学如聘请他为国文科教授,“既超出预算,且可致别科闲话”。

第五,考虑去杭州。蔡元培邀请他去杭州,“我以为蔡先生事必是蓬莱楼阁”,意思是还只停留在设想阶段,所以没去,相信蔡元培“可以谅解我不就”。

第六,考虑去中法大学。1920年10月,在勤工俭学的法文预备学校基础上,汪精卫、吴稚晖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创办北京中法大学。傅斯年对法大的分量并不满意,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去,更没有作为职业首选。1950年9月,中法大学本部和数理化学系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。1952年1月,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。1988年4月,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。

第七,考虑无奈从军。“看来此事只有两路,一仍去北京、清华、或法大(他们找我),一则弃书佩剑。”

第八,考虑做野鸡教员。他向罗家伦感慨,“四方八面,都有不可去不能去之势”。求职不顺,憋屈之余,决心从1926年11月9日写信之日开始,“发出至大至刚之怨气”。实在没办法,“只有

在上海做野鸡教员,此虽痛心,且对付一时!”甚至自嘲不如自杀,“日内方知此地野鸡教书匠之苦恼,实不如自尽之为愈也”。

最后傅斯年依靠北大的人脉,去了中山大学。1917年,朱家骅从德国留学回来任北大教授,年仅24岁,在时任北大的28位教授中最年轻。这一年,他还认识北大文科国文专业学生傅斯年,就已知他的大名,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教授,1918年任《新青年》六个轮值编辑之一的沈尹默告诉朱:“傅孟真这个人人才气非凡!”

1926年7月,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。8月,33岁朱家骅任中山大学校务副主任委员、代理校务委员,大刀阔斧整顿中大,原来的400多名教职员五分之四被免职,只剩下70多人,师资严重不足。10月22日,中大校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,延聘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。朱家骅在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》中回忆,为充实中大文学院,他与校务委员长戴季陶、副委员长顾孟余商量后,聘30岁的傅斯年,任中山大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、历史系主任。北大同窗、台湾大学教授伍倬在《忆孟真》中说,是顾孟余推荐“提议聘请孟真做文学院院长”。

朱家骅对傅斯年极其信任器重,放手由傅在中大打拼。甚至因傅坚持在厦大挖来顾颉刚教授,逼走中山大学重量级台柱——鲁迅教授,整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。这是后话。

朱家骅是栽培傅斯年的伯乐之一,也是他的职业“引路人”、事业“助推人”、政治“庇护人”,两人先后在德国留学。如果说胡适是傅斯年的思想导师,那么朱家骅就是他的职业导师。毛子水在《韶先先生哀词》中说:“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,虽有天才如孟真,即能成就,亦必困难得多。”

朱家骅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》、伍倬《忆孟真》等悼念文章,还有很多研究傅斯年的文章都称,中山大学聘傅斯年任文学院“院长”。但据傅斯年在中山的学生陈聚在《记傅孟真师在中山大学(答傅乐成教授问)》更正,傅斯年应聘任中大“文科学长”;并明确“此正名。不知何年起,改称‘文学院院长’”。

# 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创办始末

◎史海钩沉 叶叶胜舟

1947年2月,温州旅杭同乡会以杭州市教仁街(今邮电路21号)温州会馆为校址,创办“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”。1956年2月,该校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接办转为公立,同年9月,与杭州市惠兴女子学校合并,成立“杭州第十一中学”。2000年,高、初中学校实施分离,原杭十一中初中部独立为“杭州市惠兴中学”,在原址(今惠兴路11号)办学;高中部独立为新的“杭州第十一中学”,在杭州市拱墅区大关南苑八丈井办学至今。

## 同乡会创办私立东瓯中学

抗战胜利后,各界复员杭州,“为联络乡谊并谋旅杭温州同乡福利起见”,依照《收复地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》第三条丁款之规定,在杭部分温籍人士发起要求恢复同乡会。1945年12月10日,杭州市政府批准成立温州旅杭同乡会整理委员会,林树艺、张森、陈纯白、赵咏八、郑邦琨为整理员,蒋文宪为整理指导员,赵咏八为常务委员。

1947年2月24日,在温州旅杭同乡会第六次理监事会联席会议上,洪季川等人提出创办中学议案。会议同意这个提议,并要求同乡会全体理监事为该校创建发起人。同日,东瓯中学筹备组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,推选张强、陈文、林树艺、洪季川、孙孟晋、林毓等15人为校董,张强为董事长,林树艺为校长;推选苏步青、王国松、王季思、董伯豪、夏翟禅、王梅庵为名誉校董。

1947年6月4日,张强向杭州市政府呈报《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校董会请示》,《请示》提及办学背景及目的,“八年之惨烈战争,而我教育文化机关亦为敌寇袭击之目标,备受摧残,几于幸免”,又由于“我政府于国家、地方财政万分拮据之中”,所以“爰有号召社会人士捐资兴学,以协助政府发展教育之昭示”,办学的目的“为旅杭同乡子弟解除失学之痛苦”。从《请示》得知,东瓯中学成立时间是抗战后,办学目的为解决旅杭温籍同乡子女就学问题,学校性质是私立学校。11月27日,《浙报日报》对创校情况作了报道。1948年2月,分两次进行招生共600人,5月25日开学上课。《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创办经过情形报告》总结:

“本校只属初创,而地点适中;人事健全,规模已具,希望甚大。如吾旅外同乡热心于地方教育者,时予物质或精神上之援助,前途发展未可限量也。”

## 校董均为社会名流

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是在温籍旅杭同乡共同努力下创办的,在15位筹备员及校董中,党政界有:张强、林树艺、洪季川、赵咏八、林毓等;教育文化界有:郑邦琨、陈博文、褚寿康、孙孟晋等。

张强(1895~1968),温州鹿城区人,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,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中央执行委员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、浙江省参议会参议长。其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、中央党部经营多年,是资深党魁。在东瓯中学筹办时期,张强是浙江省参议会会长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,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和社会资源。

林树艺(1906~1962),瑞安人,曾任遂昌县、新昌县、浙江省浙西行署秘书处处长等职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书记长,1946年当选为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,积极参与旅杭同乡会事务,时任温州旅杭同乡会常务理事。

林毓,苍南县人,抗战胜利后,任浙江省议会议员。洪季川(洪铎),瑞安人,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,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是同学,曾任泰顺县长,时任浙江省地政局局长。赵咏八,乐清市人,曾任国民党乐清党部书记长、温岭县长,1947年至1948年,任处州中学校长,时任温州旅杭同乡会理事理事长。

在教育文化界同乡中也是人才济济。郑邦琨,平阳县人,系乐清人吴万里的夫人,担任惠兴女学校长25年之久。《温州旅杭同乡会理事名单》(1949年11月),登记籍贯为乐清人。孙孟晋,名延钊,瑞安人,瑞安名儒孙伯让之子,1947年左右,任浙江省通志馆总纂(总撰)。

名誉校董苏步青、王国松、王季思、董伯豪、夏翟禅、王梅庵均为教育名家。苏步青是浙江大学的数学家;王国松是浙江工业大学院长、著名电机工程学家;王季思是之江文理学院教授、著名戏曲家;董伯豪曾任江苏省江阴南菁中学校长、浙江大学退休教授;夏翟禅(夏承焘)是之江大学中文教授、著名词学家;王梅庵(王荣年)曾留学日本,时任钱塘江管理委员会秘书。

## 师资雄厚 学科齐全

在社会名流校董支持下,特别是在有教育、文化背景的校董指导下,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办学是高起点、高要求。学科上既有国文、数学、英文,也有地理、历史、化学、生物等主课,同时开设政治、体育、美术、音乐等副课。学校师资力量雄厚,从管理层到教师都毕业于专业院校,就连出纳及会计也是专业院校毕业。据《杭州市私立东瓯中学教职工履历表(1949年秋季)》统计,共有教职工31人,其中,专职教师23人,兼职教师2人,职员6人。

校长(校委会主任)仇岳希,1932年毕业于法国南锡大学。194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是浙江民盟重要创始人之一;副校长洪煊昌,字芷垞,国立北京大学毕业,曾任瑞安中学、永嘉私立瓯海中学、省立高级中学教职,前教育厅督学、科长,省立湖州中学校长等;校委成员陈楚淮,剧作家,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,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、浙江大学外文系任教。

1949年5月,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担任校董会董事长,并在学校兼课两年。1989年1月,苏步青应浙江师范大学《中学教研》杂志社之邀,发表《谈谈教书育人问题》一文,文中提到,“解放前,我在杭州市东瓯中学教过两年”,这是“我60年数学教育与研究中很短一段时间”。苏老此语可见,他虽只在东瓯中学教了很短一段时间,但却是难忘的经历。

夏承焘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及东瓯中学。夏承焘从1947年2月担任名誉校董至1950年1月申请辞职,担任校董共三年多时间。1949年3月11日,他在日记里载“夕作东瓯中学校歌”,可惜的是,夏承焘日记没有记载校歌。

◎史林偶拾

# 左宗棠的自荐联

□刘世河

道光十六年(1836)的清明时节,两江总督陶澍回湖南安化老家省亲。途经醴陵,知县接到通报,忙为陶总督安排馆舍歇息。陶澍下轿后,正欲进馆,却被公馆大门两侧的一副对联吸引了。上下联“春殿语从容,廿载家山印心石在;大江流日夜,八州子弟翘首公归。”陶澍读罢,不禁喜从中来。走进公馆,迎面便是一幅山水画,只见画上又有两句小诗:“一县好山为公立,两度绿水俟君清。”

如果说刚才那副对联已经让陶澍喜不自禁,那么这两句小诗则足以令他怦然心动了。这两副联正好写到了他的心里。前者上联引用陶澍一生中最高光之事人联(道光皇帝在皇宫多次召见陶澍,并亲笔为其少年读书的“印心石屋”题写匾额),下联写故乡百姓对陶澍的景仰和爱戴;而后者意思则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

山峰,皆是仰赖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。

小小醴陵,居然有我的知己!这位年近60岁的陶总督顾不上路途劳顿,当即令知县找来对联作者与他见面。这位作者,便是左宗棠。

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左宗棠虽早已乡试中举,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却屡试不第,正值怀才不遇之际。得悉这位陶总督途经醴陵后,他意识到是个不可多得的良机,便赶忙找到知县大人毛遂自荐,并用心撰写了以上两副对联。

果然如他所愿,陶澍看到他一见如故,两人通宵促膝夜谈,相聊甚欢。就这样,年轻的左宗棠以两副“自荐联”为媒结识了封疆大吏陶澍,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。而且此实为拍马之举,却毫无媚态,既讨好了对友,又不跌落读书人的面子,还借机展露了一把才华,实乃妙举也。

# 做人要有底线

□张达明

唐玄宗时,陕西有个进士叫张象,才华出众,人品极佳,却因朝中无人,始终得不到做官的机会。朋友很替他着急,劝他说:“杨国忠在朝中气势正旺,何不携重金与其结交,凭你的才华和为人,他怎么着也得给你个一官半职。”

张象微笑着对好友说:“在你们看来,杨国忠权大势大,与他搭上线,就像靠着泰山一样稳当。但在我的眼中,他其实蹦跶不了几天,因为作恶太多,百姓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。所以杨国忠不是泰山,只是一座冰山。这座冰山遇到阳光,就会融解。凡是上了冰山的人,到时想下也下不来,只能掉到海里喂鱼。我倒是劝诸位保持洁身自好,不要与奸贼同流合污,否则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”

话不投机,大家不欢而散。几天后,张象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,悄然去了河南嵩山,过起了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。

没过几年,安禄山起兵叛乱,攻下京城长安,杨国忠随同唐玄宗慌忙逃往四川。到了马嵬驿时,将士们又饥又渴,聚在一起商量后,认为这场大乱全因杨国忠而起,便愤怒地将他乱刀砍死,肢解了他的尸体,将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。杨国忠这座“泰山”,果然成了“冰山”,顷刻间就轰然坍塌了。

之前紧跟杨国忠的人,不是被流放,就是被杀头。此时,张象的那些好朋友才领悟了他关于“冰山与太阳”辩证关系的正确。

做人要有底线,活着要有骨气,宁可超尘脱俗,洁身自好,也不能低三下四,逐臭自美。

# 两代人的友谊

□李健

抗战时期,闻一多与冯友兰都在西南联大任教,两家的住所紧挨着。冯友兰之女宗璞回忆道:“两家关系极好,母亲和闻伯母常站在家门口的菜地里交谈,闻家兄弟则向我传授站立洗脚法,盆放在凳子上,人站在地上,两脚轮流作金鸡独立状,我们一面洗一面笑。”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,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枪杀,闻先生罹难后,清华大学不再为其家属提供住宅。就在闻家老小走投无路之际,冯友兰夫妇及时伸出友谊之手,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居住,让出宽敞的前院,自

家搬到狭小的后院,两家人的友谊代代相传。一次宗璞生病住院,闻家老二立雕知道后,主动承担每周三送饭的任务。饭菜精细鲜美、可口入味,还经常变换花样,吃得宗璞都觉得:“我若不痊愈,是无天理。”

1990年冯友兰去世,时在外地的闻立雕寄来了吊唁信,除了要求以他们兄妹四人的名义敬献花圈外,还饱含深情地写道:“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伯父、伯母给我们的关怀、帮助和安慰。我们两家两代人友谊,是我脑海中永不会消失的美好记忆与回忆。”

# 只字不提和李白喝酒的事

□任万杰

李白还没有出名的时候,在安徽宣城游玩并住过一段时间。宣城有一位姓纪的老大爷,善于酿造美酒,开了一家老纪烧锅。李白来到这里,对老纪烧锅情有独钟,可是兜里却没带钱,纪大爷对李白非常友善,只喝酒不要钱。

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喝酒,这一晃就是几个月时间,李白走了后,名气越来越大,全国人都知道了,那些看见过纪大爷和李白喝酒的人,就对纪大爷说:“你可以把与李白喝酒的事和大家说一说,这样来你这喝酒的人就会多了。”

纪大爷却摇了摇头,只字不提和李白喝酒的事。在纪大爷弥留之际,还反复叮嘱家人不要把这件事说

出去,家人不明白,问为什么啊?

纪大爷说:“李白到我这里喝酒,是因为酒好,我和他喝酒不要钱,是因为投缘不求回报,而我们现在借李白的名气,那就出发点不纯了,当有一天,我们的酒不好了,那些因为听说李白和我的故事来这里喝酒的人,就会把怨气撒到李白身上,这对他名声不好。”

就这样纪大爷走了,他的家人守口如瓶,当李白再次来的时候,听闻了这些事,非常感慨和感伤,大哭不已伤痛欲绝,写了一首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:“纪叟黄泉里,还应在春春。夜台无晓日,沽酒与何人?”以痴人梦语抒写无限温情。

现在有些人,为了抬高自己身价,总爱说我认识谁,其现实是这样越让人不齿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  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潘天寿给学生上课

潘天寿(1897~1971)是我国著名书画家,浙江宁海县人。擅画花鸟及山水,远师朱熹、石涛等人,近受吴昌硕影响;亦画人物。书法从钟繇、颜真卿、史孝山入手,学秦篆、魏晋碑文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美协浙江分会主席、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。图为1963年他在美术学院给国画系学生上课。照片提供者:朱积良